

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说与青年的平等观

董小燕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针对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集中爆发了各种各样以青年为主体的争取平等权利的激进运动,而六七十年代的小说则从思想上颠覆了盛行于美国青年中的主流价值观。从家庭角色、性别角色与同性恋权利的性别平等,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同美国白人之间的种族平等以及青少年小说与成人小说之间的文化平等角度探讨了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对青年平等观的解构与重塑。

关键词:美国小说;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文化平等;青年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3-0057-06

在二战后的美国历史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新左派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各种以反抗现行社会传统与文化为目标;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他们蓄长发、着异服、嗜毒品、喜群居、性放纵、听摇滚、迷禅宗;以强调工作、清醒、俭省、节欲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然而,“六十年代的核心不是变幻无常的时尚或经媒体包装的大师们信手拈来的自相矛盾的口号,也不是任何狭义的政治观点,而是发生在当时公众事件背后的意识的变迁。正是这一发生在情感与习俗深处的革命成为六十年代最持久的影响。”^{[1]5}而“这一发生在情感与习俗深处的革命”正是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革命。他们从政治经济体制、教育制度、伦理道德等几乎各个方面向传统秩序发起了猛烈的冲击,青年人的价值观遭到彻底的颠覆。他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方面的革命并非空穴来风,除了各种激进主义运动外在的表面的影响之外,更多的要从影响“情感与习俗”的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层面上去探究。文学作品作为对社会思潮、文化导向有着敏锐嗅觉作家的文字载体,最能反映社会大众思想意识层面的变迁。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作家首当其冲,亲身践行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

有的甚至被誉为反文化运动的宗师。本文拟探讨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与青年价值观的平等观的互动关系,分析反文化因素如何渗透进了当时的小说,而小说又如何诠释了反文化因素,进而重塑了青年的平等观。

平等是美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也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特性。自美国建立之初,“人人生而平等”就被写进了《独立宣言》。然而,在美国数百年的历史中,平等并不先验地存在于美国宪政史中,从制宪到杰克逊民主、从内战到进步主义运动、从妇女选举权到民权运动,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直在努力争取着他们应有的平等权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性别平等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标榜是一个人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国度。但是,从美利坚的先祖签订《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再到建国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选举人”及《权利法案》的相关条款中都没有妇女权利的存在。因此,美国的性别歧视由来已久,男女不平等和女性受歧视的意识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就一直盛行于美国。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1920年美国妇女终于拥有了选举权,但也仅仅标志着妇女争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平等的

收稿日期:2014-04-10

作者简介:董小燕(1981-),女,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开始,妇女在就业和工资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应该属于男人,家务领域属于女人的这种社会意识仍然根深蒂固。新政和二战时期,因男性入伍劳动力的空缺,一定数量的妇女成为普通劳动者。二战后,军人退伍,妇女参加工作对退伍军人就业形成竞争。这时,主流社会开始宣传“真正的女性”^[2]和“郊区家庭主妇”^[3]形象,号召她们离开工作岗位,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很多妇女积极响应号召,回到家中继续做她们的全职家庭主妇。

1. 家庭角色平等

受当时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性解放的影响,回归家庭的主妇们不再以丈夫孩子为中心,自我意识日渐觉醒。传统的“恋爱——婚姻——性行为——生育”的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开放的性观念和家观念。离婚、婚外情、乱伦的现象在当时的小说里屡见不鲜。《兔子归来》(1970)中兔子哈里的妻子詹妮丝与 50 年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从兔子眼里笨拙邋遢的酒鬼变成了一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妇女。她接受了父亲车行的部分股票,成了有钱人。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她的家庭地位也相应提升,因不满琐碎枯燥的家庭生活和庸懒散慢的兔子,她还和同事查理搞起了婚外恋,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追求自我,后来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还与情人同居。可以说,詹妮丝代表了很多当时的家庭主妇,从对家庭和对男性的依赖到逐步走向独立。《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1964)中的主人公汉克·斯坦普和他同父异母弟弟李的继母麦拉关系暧昧,而多年以后李又诱奸了汉克的妻子薇芙,以这种不道德的乱伦关系报复了对他来说半是兄长半是父亲的汉克。姑且不谈这对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论麦拉和薇芙在伦理道德立场上的对与错,这种乱伦关系表现了她们不再囿于传统的道德观念,性观念和家观念。

2. 性别角色平等

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男权社会对女性温婉可人、善良贤淑的完美女性形象的塑造,取而代之的是飞扬跋扈、独裁专制、人人见而生畏的“母夜叉”形象。《飞越疯人院》(1962)中“大护士”雷切德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汉子。“她是个女性,却没有女性的温柔善良。她那丰满的胸部被紧紧地束缚在她那熨得笔挺僵直

的白大褂底下,象征着女性热情、温柔、宽容等特点被冰冷、僵死、机械的高效率所扼杀。”^[3]在疯人院里,大护士就是权威,容不得丝毫的质疑和反抗。任何挑战她权威的人都被视作异类,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她通过药物、电疗、脑切除术等医学手段和暗示、羞辱、恐吓等心理攻击从肉体和精神上迫害这些病人,使他们成为一具具没有思想、没有人性的行尸走肉。甚至那些医生都要臣服于她说一不二的威慑力,听命于她,不得有一丝一毫自己的主张。她对病人的威慑力在于她至高无上的权威,来源于布朗顿称之为“康拜因大机器”的专制残暴的统治机构,通过各种现代化的高压手段控制、驯服病人。她剥夺病人音乐、欢笑、爱等人类正常的娱乐和情感,代表了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为了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工作能力获得他人认同,她付出了牺牲基本生活乐趣和女性气质的代价。这样一个独裁专制、非女性化的反传统的女性角色的塑造,有力颠覆了当时主流社会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界定。

3. 同性恋权利平等

在性别平等问题上,最有争议且反抗也最为彻底的是性权利平等,这并不局限于男女双性别上,还有女同性恋者为打破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女同性恋者由来已久,但 1969 年美国的“石墙酒吧造反”(Stonewall Inn Rebellion)将这一隐秘的群体推到了镁光灯下,揭开了他们反抗主流社会、争取自身权利的序幕。“同性恋解放运动”(the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亦紧随其后。受这种氛围的鼓舞,很多女同性恋者拿起手中的笔勇敢地记录下同性恋群体所遭遇到的误解歧视以及自己对女同性恋者处境的感受体会。“虽然成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不是第一代公开承认她们同性恋关系的群体,但她们却能够确立有记录以来最有生气、最有说服力的‘同性恋文化认同感’(sense of lesbian cultural identity)”^[4]。这一时期出色描写了女同性恋者争取权利运动的当属丽塔·梅·布朗的代表作《红果丛林》(Rubyfruit Jungle)(1973)。在这部半自传性的处女作中,布朗记录了一名女同性恋者莫莉生理与心理的成长历程:从孩童及中学时期同自己的女伙伴及拉拉队长发生了极为亲密的肢体接触行为到大学时因与室友成为同性恋人而被校方开除,莫莉拒绝各种对女孩的传统限制。在孩童嬉戏时,莫莉坚持要扮演只有男

生才能当的医生;在家中,莫莉拒绝学做家务宁可逃跑;在学校,莫莉战胜男生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在纽约,莫莉誓要在导演界闯出她的一片天下。她否定家庭、拒绝婚姻、从事男性职业,憧憬建构一种容许两性完全独立、自由、平等的理想境界。她要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传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体制宣战,冲破父权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限制,颠覆了父权文化所构建的性别角色,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鼓励女性找到真正的自我。

二、种族平等

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另一个不平等现象。最初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美国移民都是为了躲避英国宗教迫害的新教徒,他们有一种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常以主人翁的姿态强行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意识灌输给处于相对弱势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因此,在强势的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打击下,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方面为了融入白人的主流社会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因无法做到完全的融合又逐渐远离或丧失了自己本来的种族传统和文化,因此他们成了一群有着“黑皮肤/红皮肤/黄皮肤白面具”的边缘人。

1. 黑人

美国黑人自1619年踏上美洲大陆这片土地以来,就长期受到歧视、压制与迫害。黑人问题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中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的问题之一。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黑人一直受到事实上的歧视与隔离。二十世纪初,黑人几乎还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杀戮黑人事件和私刑事件时常发生。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黑人的处境仍未有大的改善,相反“白人至上论”却日益盛行于南方各州。二战的爆发被看作是黑人民权运动斗争史上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它“播下了五六十年代抗议运动的种子。”^[5]二战使美国充当了参战国的兵工厂,也为长期受到高失业率困扰的黑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部分黑人的参战使他们自我意识和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飞越疯人院》中的三个黑人看护身上几乎集中承载了美国黑人的所有苦难遭遇,是经过大护士“好几年千挑万选才留下来的”^{[3]31},正如大护士所说,他们“对人恨得深,下得了手”^{[3]31}。因此在小说里,他们经常对白人病友嘲讽辱骂、拳打

脚踢,同大护士一起从肉体和精神上打击迫害这些病人。作为见证了民权运动点滴收获和进步的年轻黑人,他们努力趋同于白人的行为准则,“这3个黑人的制服永远是雪白的,上面一点污迹都找不到。和她一样,又白又冷又硬”^{[3]32}。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理,美国黑人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被视作二等公民。“她只要看他一眼,就能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的头发和眉毛都冻上霜了,两条胳膊抱着前倾的身子,步子越来越慢,半天都走不到她跟前”^{[3]108}。黑人固有的民族文化印记难以磨灭,对白人来说,他们仅仅是一群有着“黑皮肤白面具”的边缘人。这种模棱两可的文化身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使他们生活于两种对立和错位的文化夹缝中。由身份困惑带来的灵魂的折磨、文化的错位和希望的屡次破灭导致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心理和对白人的无比仇恨。

《兔子归来》中的斯基特则是另一类激进黑人的代表。他坐过牢,参加过越战,激进好斗。从他进入白人兔子哈里的家庭之后,斯基特不断地给哈里洗脑,通过一次次有关种族与战争问题的争论将他从“白人至上”的民族中心主义泥淖中拉了出来,颠覆了他原先对黑人的“一种自我矛盾的态度”,即“一方面不得不接受黑人的存在及其文化,但另一方面却尽力要使自己区别于黑人,划清界限。”^[6]最终他重新认识了自我和他心目中的上帝——美国,也认可了黑人的价值观。可以说兔子哈里身上突出体现了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带给青年平等观的变化。

美国的种族歧视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对于少数族裔妇女来说,她们更是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从独特的角度描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歧视的同时揭露性别歧视,反映黑人妇女尴尬而艰难的处境。《最蓝的眼睛》(1970)讲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故事。她在家中得不到父母关爱,在外面受尽他人凌辱,她把一切都归咎为自己长相丑陋,因此日夜祈祷能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可是这个异化自我的愿望,最终带给她的却是精神错乱和自我崩溃。小说表现了佩科拉及她所代表的黑人女性群体在强势的白人文化冲击下的心灵迷失和自我否定,对白人文化和价值取向的盲目崇拜,以及对自身传统黑人文化的盲目贬低甚至完全抛弃的一种病态心理。尽管在美

国黑人奴隶制已被废除多年,但长期以来种族歧视与偏见仍然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黑人女性都被这两个运动排除在外,没有分享到斗争的成果。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者,黑人女性在不正确的文化认同中,彻底在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这三方面被白人和黑人男性所奴役。

2. 印第安人

17世纪初,最早的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在土著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才安然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并顺利定居了下来。但他们很快就恩将仇报,在这数百年里陆续通过实施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和强制同化政策来驱逐、剿灭、同化土著印第安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数百年来印第安人在强势的白人统治文化的打压之下一直处于被边缘化、被消声的状态。

《飞越疯人院》中讲述整个故事的布朗顿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印第安人在强势的白人统治文化的打压之下,自我否定、失去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而自我退却封闭的失声过程。作为一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儿子,他亲眼目睹了曾经高大强悍的父亲如何在白人妻子的“教化”下逐渐变得卑微弱势、如何借酒消愁一蹶不振、如何丧失了自己的印第安部落传统最终被政府的威胁击垮的整个过程,以致于变得胆小怯懦、神智不清,听凭他人的摆布。最后在另一个病友麦克墨菲的帮助下,他从麻木的知觉和情感中找回了记忆,重拾了勇气,恢复了自信。可以说,布朗顿意识和人性的恢复代表了整个北美印第安人政治和文化意识的觉醒。但白人作家凯西对印第安人角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想象的成分。而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确有美国印第安人的本土作家通过创作努力来刻画真实的印第安人形象,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种族困境。1968年,司格特·莫玛黛发表了《日升之屋》,讲述了一个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传统文化决裂,当面对美国主流社会却感到陌生的经历。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也带动了其他大批印第安作家热情从事写作,这导致了六十年代末著名的“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

自此之后,随着民权运动和各项权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印第安人的族裔意识日益高涨并付诸行动:广泛开展泛印第安人抗议运动;建立全

国性土著组织;强烈要求维护土著民族的条约权利和群体权利尤其是土著自治权,“红种人权运动”应运而生。虽然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平等,美国土著人在整个六十年代在民权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收获:1968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民权法案》(The Indian Civil Rights Act),该法案确保美国土著人享有美国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各项权力。这些成果激发了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表达了他们要捍卫自己领地的决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贫困落后的现状。

3. 其他少数族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感染并唤醒了包括华裔、墨西哥裔和犹太裔等美国其他少数族裔人民的民族意识。身处美国这个各民族的大熔炉,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的本民族文化被美国主流文化吞噬、同化的命运,因此这些少数族裔的作家也纷纷将他们的忧虑与努力诉诸文字,创作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华裔作家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还是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也不论是墨西哥裔作家路易斯·巴尔德斯的《阿兹特兰》(1972)还是阿·鲁道福·阿纳亚的《阿兹特兰:没有边界的家乡》(1989),大多反映了在美国强势的主流文化下的族裔认同。他们的作品大多早于或晚于六十年代,但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说,(这些文学作品)“酝酿时间很长,因此很难说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它们出版的那个时期。但是,正如我试图表明,那个时期的文化环境也酝酿了很久,而这些作者的单独劳动无疑代表了酝酿过程中的一些阶段。六十年代的新情感异常普遍;现在回顾起来,我们能够看到它如何触及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而任何一个角落在仔细观察之下都有助于揭示全面的骚动和改革运动。”^{[1]102}

这一时期的犹太裔作家主要表现的是处于种族和文化夹缝中的犹太人的困惑心理和非我意识,以及由此引起的局外感和边缘感。索尔·贝娄的《赫索格》(1964)就是这样一部杰出的反映当代犹太人生存处境和困惑的小说。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但他敏感离群,两次婚姻失败,他像一位局外人游离于家庭、社会之外,四处流浪却找不到精神出路,他内心痛苦异常,不停地给各种人写信,希望借此探寻生存的意义,表现的是人的价值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尖锐冲突,揭示了当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应该

说犹太小说具有更广的普适性。

迄今为止,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人权的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并没有完全地根除。但随着民权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多元文化的持续繁荣,少数族裔这些边缘群体的边缘文化逐渐享有与白人主流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从众多反映少数族裔或少数族裔作家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

三、文化平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种类繁多、精彩纷呈的美国小说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青少年小说。青少年作为跨入青年阶段前的一个稚嫩而又敏感的群体,他们对世界的初步认识业已形成,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确立,小说等文学作品既再现了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懵懂、困惑与思索,又构筑了他们对理想社会中平等、正义与尊严等价值理念的追求。

1. 青少年小说与成人及通俗小说平等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青少年文学发展的开端、演变到成熟主要发生在美国。早期的美国青少年文学主要以浪漫故事和系列丛书为主,这些作品在文化和思想上都比较保守,主要关注青少年成长话题。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相当于青少年文学作品的一个分水岭,霍尔顿标志性的生活化语言和对成人世界假模假式的批判被战后青年奉为心目中的《圣经》,风靡一时,影响深远。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青少年文学从前期“虚假的乐观主义和说教性质”^[7]转向对青少年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吸毒、酗酒、犯罪、性行为、怀孕等诸多问题在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中层出不穷。揭露这些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有S·E·辛顿(Hinton)的《局外人》(The Outsider, 1967)和保罗·金代尔(Paul Zindel)的《猪人》(The Pigman, 1968)。这两部小说以日常生活化的语言真实描述了处于社会底层青少年的成长困境和他们酗酒、吸毒、斗殴等问题。而罗伯特·科米尔(Robert Cormier)的代表作《巧克力战争》(The Chocolate War, 1974)则通过暴力的黑暗视角和象征主义手法揭露了校园的权力操纵、恃强凌弱和正义惨败的黑暗内幕。当时关注青少年面临的“残酷现实、道德困境和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由于一再突破禁忌话题,常常招致争议。首位获得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的青少年小说家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代表作《永远》(Forever, 1975)因涉及青少年的性行为而多次遭禁。从中可见,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小说,也从先前刻板保守的有限范围拓宽到了成人面临的吸毒、酗酒、犯罪、性行为等,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青少年小说被视为通俗文学的固有形象,一跃成为与成人及通俗小说具有平等地位的文学类型。

2. 历史记忆的平等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自美利坚共和国建立伊始,各种肤色、各个民族来源的移民源源不绝。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史在美国历史课本上竟然有所缺失,这对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作为对教科书中相关历史缺失的补充,反映美国历史上重要阶段的青少年历史小说应运而生。有反映美国独立战争大背景下普通少年提姆的困惑、选择与成长的《我兄弟山姆死了》(My Brother Sam Is Dead, 1974),有以一个被拐上贩奴船的白人少年杰西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十九世纪美国贩运黑奴罪恶交易的《月光之号》(The Slave Dancer, 1974),还有描写了二战期间犹太人普莱茨一家逃离纳粹德国并移民到美国的曲折故事《美国旅程》(Journey to America, 1970)等小说。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非裔小说,尤以米尔德丽德·泰勒(Mildred Taylor)以她自己家族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少年历史小说三部曲最为突出:《滚滚雷声,听我呼喊》(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 1976)、《让圈绵延不绝》(Let the Circle Be Unbroken, 1981)、《通往孟菲斯之路》(The Road to Memphis, 1990)。这三部曲中最为著名的则是第一部《滚滚雷声,听我呼喊》。该书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种族歧视严重的密西西比为背景,通过九岁黑人女孩凯茜·洛根之口讲述了洛根一家面对白人的歧视和经济压迫努力维持生存和尊严的故事。作者通过该书重新发掘本民族的历史,赞美自己的种族与文化,纠正受以往文学作品和媒体歪曲的黑人历史和形象。这些对过去生活、历史事件的成功还原再现以及文本背后的教育意义,不仅帮助少数族裔的青少年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历史,也为所有少年读者了解美国文化大熔炉中不同族裔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在美国的多元文化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离现在已渐行渐远,但

六七十年代的余音却久久未能散去。除了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开展为美国国内的各少数民族裔赢得了一些平等的政治权利,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更帮助人们重温了那个充满了激情与梦想但又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年代。虽然这些反叛激进的青年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因现实生活所迫大多又回归了他们之前反对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的主流

社会文化,但他们为之奋斗的有关性别、种族与文化平等的价值观最终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走向了社会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边缘文化被更多的人接纳认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裔作家代表本民族书写着他们自己的诉求与心声,美国这个熔炉社会最终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 [1]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第二版)[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2] 吕庆广. 略论美国社会价值观及其变迁[J]. 江南学院学报,2000(1):62-69.
- [3]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4] 金衡山. 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2.
- [5] [英]J. R. 波尔. 美国平等的历程[M]. 张聚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35.
- [6] 单建国,张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青少年小说概述[J]. 广西社会科学,2012(12):120-124.
- [7] 王超. 浅析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77-79.

American Novels of the 1960s and Youth's Value on Equality

DONG Xiao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long-existing sexism and racism, with youth as the main body, various radical movements aiming at winning their equal rights broke out intensive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novels of that age ideologically subverted the mainstream values. This essay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1960s and 1970s American novels' deconstruction and remodeling of the youth's value on equality from the sexual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racial equality between the American whites and minorities like the black, Indians and the others and cultural equality between the adolescent novels and the adult novels.

Keywords: American Novels; the 1960s and 1970s; sexual equality; racial equality; cultural equality; youth's values

(责任编辑:李 军)